



阅读史雷的作品,能够欣慰地找回一种经典的文学感觉,而这种感觉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正在逐渐“褪色”。

史雷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中短篇小说,《定军山》讲述了旧北京一名贵族遗少“图将军”把玩蛴螬的故事。小说主题带有敌我较量的色彩,但作者却没有对故事中事件的输赢对错等概念进行简单判断,而是以日本蛴螬爱好者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同时也点醒了读者:“如果中国人能把这种精细劲儿放在经国大业上,那么这个国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吗?”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庆祝比赛胜利的爆竹声,而“我”却由此想起了“七七”事变时从卢沟桥畔传来的枪炮声。在《定军山》中,作者自始至终都采用了一种冷静的客观陈述,无论针对家事还是国事,都没有跌宕起伏的变化,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方式逐渐推进,最终走向故事的结局。

《将军胡同纪事》更是一卷有关古都北京的风土人情画,作者把诸多材料全都加诸于此,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现他对北京的深情厚爱。当然作品的主线索依旧是日军的入侵与中国人民的反抗——但这种入侵并非简单的军事占领而是多方

短 评

## “萌”世界中的生活美学

如果说幼儿图画书的至高境界是在不经意的稚拙童趣间弥漫出令成人世界会心微笑之气质,我以为,工藤纪子的“幸福小鸡”图画书系列达到了这个高度。该书以极为柔和的线条与色彩创造出了一个圆润、光滑的“萌”世界。徜徉在这个美丽恬静的世界,细细品味由小鸡们的“吃”、“玩”和“睡觉”所构成的日常生活,我们发现,工藤纪子所创造的“萌”不仅仅是一种清澈、透明的可爱,更是一种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审美品味和生活态度。

这套图画书分别以“逛超市”、“去游园”、“过生日”、“过圣诞节”和“去露营”为主题,讲述了5个独立的小故事。对幼儿来说,这些故事既熟悉又洋溢着某种节日的狂欢。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似乎都与“吃”密不可分。透过“吃”这一在生活中最日常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作者融入了许多言外之意,它们既关乎心理也关乎美学。

现代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在人类的文明构成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是最基本的一对概念。前者是一种不断去追逐享受和快乐的欲望,后者是一种压抑这种欲望去做“正确”事情的理智。每个个体的成长就是如何通过“升华”这一心理过程让“快乐原则”从属于“现实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的一生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永久性地处于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中,如果对“快乐原则”过度地压抑,则会引发各种心理疾病。对此,《幸福小鸡逛

短 讯

### 探险家贝尔新书在京发布

美国探险家贝尔一直以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示人,但同时他也是3个男孩的父亲,对孩子有着一颗柔软的、充满爱的心。从2008年起,贝尔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通过13岁的主人公贝克的野外冒险经历,传达了他的求生技巧和生存哲学。今年10月,接力出版社继续推出贝尔撰写的全新户外生存百科系列——《贝尔写给你的荒野求生少年生存百科》。

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贝尔是一种精神,他所倡导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的理念是中国孩子在生存中最应获得的钙质。贝尔微笑着面对危难的态度是时下未成年人甚至成年人需要学习和坚持的,而他所介绍的生存技巧也是我们孩子极度匮乏的,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在危难时理性面对,赢得生机。此外,骆桂明、张永将等从不同角

度的,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同样的,人民的反抗也不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此外,他的作品还有《三大旗》《血色门神》《桃城烧》《黑玉》《远去的誓言》《老虎凳》《完美游戏》《寻找王桂芝》《黑猫的咒语》《美梦淘换店》《校园迷影》《黑褐色陨铁石》《怀念蜻蜓》《字库塔》《向一只小鸟致歉》《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一杯茶 一本书》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传统文化与抗日行动是被作者格外垂青的两大主题,这恰好反映出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热爱。

史雷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家国情怀,这是作者立足于民族与传统的一种文化自觉——从构思到情节,从主题到形象,史雷的作品都在力图展现一种“中国味道”,以此来着力体现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中所包含的精神价值。作者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仁慈之心,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朴素而单纯的情感,但有时我们还是会读出作品中一种若隐若现的负疚心理,似乎在传达作者某种内心的情绪。

尽管作者对于上述情愫充满迷恋,但读者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流露出的某些矛盾。有时为了以一种真挚的热爱,作者甚至不惜揭开传统文化中令人不悦的伤疤,读者可以由此感受到作者痛苦的内心世界;而当作者在描绘一组组传统或民俗的风情画卷时,其作品在向我們展示传统文化古朴之美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作者乃至整个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惑与纠结。

史雷的作品以北京为背景者居多,时间上则多集中在日本侵华占领北平前后,并借此描述当地人民在这种隐忍与反抗的半压抑状态下的日常生活。但史雷的

### “幸福小鸡”系列图画书：

超市》呈现了一种艺术的“渡引”功能：

小鸡、小猪们的行为代表的是一种“快乐原则”，它们随心所欲地往购物车里放着牛奶巧克力、甜甜圈、布丁、雪糕……而妈妈们则是“现实原则”的捍卫者：只买购物清单上所列的生活必需品，热衷于采购促销打折的牛奶……最终，“现实原则”在收银台前成功压制了“快乐原则”：小鸡们想要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买。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5只小鸡垂头丧气、眼泪婆娑，妈妈们则喜气洋洋、满载而归。在这场“权利博弈”中，妈妈完胜。

那么，如何让被压抑的“快乐原则”获得宣泄的渠道呢？工藤纪子创造了两条通道：第一条早在“压抑”发生前就已经铺设，超市中小鸡与小猪的捉迷藏游戏、河狸宝宝抱着妈妈大腿耍赖、小鸡们在货架上自由跳跃等场景均渲染出“小鬼当家”的狂欢性。显然，作者笔触之下的用心用力都满溢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幽默。第二条通道则沿着故事脉络顺势而下，下班回来的爸爸给小鸡们洗澡，小鸡们一边进行着“浴缸游戏”一边倾诉对妈妈的不满。在这里，爸爸“倾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着，妈妈则用一道美味的意大利面证明了“现实原则”的正确性，“口”与“胃”的满足让小鸡们完成了一次潜移默化化的“升华”。

以“萌”的方式来缓解成人思维与儿童思维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这是一种柔

作品又与传统的抗日题材作品不同，他是通过中日两种文化的深刻对比，展现出被占领国人民的不屈反抗。尽管山河已经破碎，但被占领区的人民还要生活，这反映出一种相对真实的现实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北京文化极为迷恋，但史雷其实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只是童年时期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种独特的文化产生了深深的迷恋，直到18岁后再次回到北京读书、工作和生活。史雷对北京的昔日印象，因其在作品中的描述和勾勒而不断加强，最终描述出一个混杂着个人记忆与个人构造的“想象中的”北京。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北京这样一个移民城市里，真正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已越来越少，即便是“京一代”、“京二代”也已日渐萎缩，真正新一代的北京移民正在开始思考和描画他们心目中的北京。

略显遗憾的是，在史雷的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静态的、凝固的、昔日的北京，而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应该是一个在时空范围上延展性更强的概念。近代意义下的北京不仅是日占时期，还包括清末民初、北洋政府以及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等时期；就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北京也不仅仅具有城墙与胡同的特征，这座正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也拥有宽敞的街道、林立的楼宇以及诸多现代化企业。当代一些作家对昔日北京的描述，总让人感觉略有遗憾与欠缺，假如史雷能将自己对北京的情感“扩张”一下，不再局限于一场个人的叙述或对一座城市的描摹，那么将构成一部整个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历史。

史雷的作品往往通过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捕捉老北京的风情风貌，以展现一幅特殊历史时期的百姓生活画卷。在情节的推动方面，作者比较喜欢用大段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来展开情节，尤其喜欢使用双线结构来叙述故事，而在一些非对话与心理的细节展现上，作者的描写也同样出色——诸如《将军胡同纪事》中“蟋蟀战

□陈恩黎



斗”部分，从蟋蟀的外貌到动作，从观战人群的神态到心理，全都惟妙惟肖。当然，使用这样大段的笔墨来描述场面，似乎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叙述方式，尽管这也许是作者记忆中弥足珍贵的一幕，但落到笔下却有可能难以吸引当代的少年读者。

此外，作者喜欢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心理描写，从“我”的角度用所见所闻来介绍人物和叙述故事。但有时作者难免有些过于强调“自我”的感受，使得这种“经验”变得相对狭隘。另外有些地方的第一人称其实可以省略，以使叙述语言更为精练。

一般来说，史雷对故事的叙述相对比较平缓，高潮往往不是十分明显，但有时却会有一个简短有力的结尾，会在结尾为我们燃起希望。比如在《将军胡同纪事》中，当武汉沦陷后，日本老师带领孩子们唱《樱花》歌，而小主人公“我”却用聪明智慧巧妙地避免了这样的文化“侮辱”——这不禁让人想起都德《最后一课》的结尾。此外作者还用新生的婴儿、鸽子的腾飞、花朵的盛开来象征民族的希望，昭示着这些孩子必将成为承载民族使命的继承者。作者对于场景和事件的描述采用了经典文学中不紧不慢的叙述方式，具有着别样的文学意蕴，然而在这样的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方式难免有缓慢拖沓之感，或许也会令少年读者不易接受。

无论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结构，还是那些描写人物神态和心理的语言以及那种不徐不疾的叙述方式，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刻痕迹，有时我们甚至能从史雷的作品中捕捉到传统评书的味道。

作为一种总体感觉，史雷的作品也许会有种时代感的缺失，因而弥补现代性的不足或许也是史雷的一个努力方向——这里不指形式，仅指观念。但就纯粹的创作理念来说，在这样一个文学娱乐化的时代，与其降低身段去迎合潮流，不如坚持自己的本性化写作，保持自己的固有优势，继续描述自己内心中那些神圣的东西。

### 从十二个汉字中品历史

汉字的文化意蕴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大众中也不断升温。11月11日，张一清《百家讲坛系列·十二个汉字品历史》新书品读会在京举行。谭景春、蒙曼、关正文出席了本次活动。

张一清致力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推广。新书《十二个汉字品历史》独辟蹊径，从中国历史上12个王朝的名称入手，梳理历史更迭的线索，盘点风云变幻往事，为读者揭示王朝名称用字背后的奥秘，展现汉字所承载和传达的巨大文化能量。深入浅出的文字配以100多幅珍贵的史料图片，增加了趣味性和可读性，使其成为接力出版社国学板块的重要作品。

品读会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汉字与历史、汉字与传统文化、汉字的国际影响力、汉字的演变、汉字与个人生活、汉字与新媒体、汉字的推广、汉字的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张一清认为，我们对汉字习以为常，却很少认真体味它的内涵，将汉字与历史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可以唤起我们对汉字、对历史的新鲜体验。

（于文翰）

### 童书少数派

弗吉尼亚·伍尔夫终其一生都没有生育,而且对孩子十分惧怕。她在一封家信中曾说:“小孩子简直是魔鬼……连声音也无比可怕,没有人会愿意安慰他们,或者假装他们真的是人类。”但是,伍尔夫有兄弟姐妹,他们的下一代让伍尔夫无所用心地与童书结了一点小小的缘分,写出了现存的两本童书《寡妇和鹦鹉》(The Widow and the Parrot)和《鲁顿奶奶的窗帘》(Nurse Lugton's Curtain)。

《寡妇和鹦鹉》的故事与伍尔夫的姐姐凡妮莎·贝尔一家有关。1919年,伍尔夫夫妇将乡间别墅搬到了凡妮莎一家附近,1922或1923年间,凡妮莎的两个儿子昆汀和朱利安正为家庭日报萧索的稿件来源发愁时,惊觉平时说话有趣又不着调的姨母弗吉尼亚就在不远处,据说还在写小说,不征用实在可惜。谁知伍尔夫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交出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说教故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主角是位老太太。老太太很少往来的哥哥去世,将家宅赠予她,附带一笔数目不少的遗产。穷困潦倒的老太太欣喜不已,匆匆奔丧去了。可是,哥哥家的房屋早已凋敝,房中仅有一只躁动不安的鹦鹉时而怪叫“不在家”。当老太太向律师索要遗产时却被告知,他们搜寻了屋内一切角落,并没有发现一分钱。老太太只得在暮晚的河边寻找回去的路,由于这条河涨水时淹死过人,她无法在夜晚过河,而不过河又势必冻死在这荒郊野岭。正绝望时,对岸蹿起了一片大火,着火的正是哥哥的房子。老太太过河后想到鹦鹉还在屋里,一度想冲进去营救,都被邻里拉住。幸好鹦鹉也并未被烧死,它夜半引领着这位善良的老太太来到废墟里,找到了埋藏在厨房地砖下面金灿灿的遗产。

故事一波三折,欲扬先抑,写法纯熟。语言也是信手拈来,还掺入了伍尔夫式的幽默。但是,学者们实在找不到一丁点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相关的迹象。昆汀·贝尔看到此稿也“十分震惊”,但他终于抑制了退稿的念头。60年后,他从故纸堆里翻到了这本手稿,嘱其子朱利安·贝尔作画,把一个家庭事件推向了公众。

对于《鲁顿奶奶的窗帘》,学者们稍显热情些。故事创作于同一时期,主人公还是一个老太太,夜深了还在帮隔壁家有钱的夫人缝制一幅窗帘。缝着缝着,她就打起盹儿来。窗帘上的动物图案都活过来了,浩浩荡荡地要去山涧饮水。然而,砰的一声油灯被碰倒,惊起了老太太,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这个故事体现了伍尔夫一贯的、对女性以及作者身份的探索。首先,主人公是在缝制窗帘。缝制、编织、纺织,这些都是女性在从事家务活动时比较重要的一门手艺。对它的敬意也早在古希腊神话里就有所表述。鲁顿奶奶创造出了窗帘上无数的动物:羚羊、长颈鹿、老虎、大象……赋予了它们形象,以及她所不知情的、夜晚的生命。文中描述说,“它们的前方是鲁顿奶奶金色的顶针,燃烧如太阳”。这用力的一笔似乎是将鲁顿奶奶的活动与创作,与作者自浪漫主义以降享受的、上帝一般的角色对等起来。

窗帘上的动物和小人们对鲁顿老太太进行了有趣的反观,称她为“伟大的女魔头”,因为:“他们(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窗口看到,她在他们头上高耸着。她的脸像山峦,眼睛、鼻子、头发、牙齿像是悬崖和深谷。无论是什么迷了路的动物进入她的领地,她都要就此把它冻住。因此,动物们整天僵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待在她的膝头。当地睡着了,它们才能自由活动,高高兴兴地在晚上下山来,去小水泊里饮水。”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借人物角色之口,对作者的角色进行了修正。她暗示了作者的创作并非无中生有,而仅仅是一种借用。与浪漫主义下的梦境不同的是,伍尔夫笔下梦的制造者并不能进入梦境,继续成为那里的观察者。鲁顿奶奶只有在完全无知觉,把意识交出去的情况下,才能解放出更多的生命。睡梦、记忆、无意识,这些都指向了弗洛伊德。事实上,1917年,伍尔夫夫妇建立了 Hogarth 出版社,1922年开始着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使之成为众多一流作家、学者首版英译本的诞生地,这其中就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论文。所以,伍尔夫可能在童话中也流露出了一些弗洛伊德的影响,1925年的《达洛威夫人》则以大量的意识流描写正式打上了弗氏印记。

当然,学者们对文本的阐释也并不局限于此。有人说,动物们能在夜晚活过来,象征了作者对文本自身多义性的信任;还有人说,鲁顿太太睡着了,是表达了作者的恐惧——她害怕面对这个创作过程,害怕将她的造物窒息在一个小空间里。

可惜的是,它在童书界也并不十分讨好。有人说,伍尔夫并没有因为它的读者是孩子而减少使用过长的从句,甚至一句话里用了5个分号这种相对高级的标点,而新版绘者,也许因为来自澳大利亚,并没能替读者还原出伦敦20年代的气韵。

总的来说,伍尔夫现存的两本童书作品受到的关注度不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成绘本出版之后,就没有再版过。不过,只凭作者是伍尔夫这一点,它们就像印钞机印出的错币,虽然不大可以流通,却有一种脱离轨道而独一无二的价值。

### 封面欣赏

儿童文学评论

我和爷爷是战友

我和爷爷是战友 赖尔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年5月

第387期

□李拥君